

研習營心得報告

皇權旁的地方文化：從國家角色看南北方差異

呂雙 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博士生

研習營短短十數日，所學內容由古及今，雖僅觸及齊魯文化的一些零碎特色，也足以形成對心中存放已久問題的沖擊與反思。茲僅以“國家的地方呈現與參與”為線索，整理數言，以記心中感慨。

首先，最為突出的特色體現在橫向的區域比較中。在北方地區，國家以不同的身份活躍於各個場合，不同於南方常常隱於生硬制度之後隱約的影子，“國家”這一角色在北方的地方社會成為了不可忽視的重要參與者。學界對地方社會的研究尤以華南學派最為突出，該學派承襲傅衣凌、梁方仲等先輩所開啟的從小歷史中發現大歷史的研究路徑，逐漸形成的以華南地區為主要研究對象，通過對地契、碑刻、族譜、宗教儀式等的研究出發對傳統歷史論述展開討論與挑戰，雖為傳統史學輸入了全新血液，卻往往難以規避“國家的角色在哪裏”的質疑。而此次的考察則正好提供了截然不同的地方文化特色，國家跳入到地方社會的前台，成為了主角之一。最為生動的例子即是泰山的碧霞元君祠。

碧霞元君於宋真宗時期得到朝廷的賜號，明清時期香火盛極一時，不過其却始終未被納入官方正祀系統，有趣的是國家對於這一民間信仰卻以各種形式表現著支持和認同。正德十一年（1516）明武宗允準對泰山碧霞元君祠征收香稅，嘉靖十一年（1532）皇太后遣太子太保於此為世宗求子，而祠前右側所立萬曆碑更明述在此“神宗皇帝欽傳普修泰山與民同善”，碑陰還有太后、妃主、皇子、宗藩、侍臣等的題名。可見在泰山的碧霞元君祠，“朝廷”一詞不再遙不可及，而是通過代表朝廷的各種身份的人（皇帝、太後、內臣、京官等）呈現出不同的訴求，而國家也不僅為其提供管理政策或賜予封號的政治職能，亦可是一種有血有肉的存在，在對待碧霞元君這一信仰時，既有對家事的祈福又有對國泰民安的祝願，而這些都引出我們新的思考，在北方特殊的語境下，如何理解所謂“淫祠”與“正祀”？如何處理國家在民間信仰變化過程中的角色？又如何去分析民間信仰傳播背後所存在的朝廷以及地方動力？

其次從縱向層面而言，國家權力在地方的呈現與表達也絕非一成不變。一方面，空間文化內涵的轉變映射出時代的變化，以孔廟為例，做為帝國禮制的象征，

其“去神聖化”的過程印證了帝制的終結。黃進興老師的演講生動的展現了孔廟在傳統中國所具有的封閉性，自漢以來，隨著成為官廟的孔廟政治性的加深，其於百姓則逐漸疏離，直到近代以來圍繞對“祀孔”、“孔教運動”的批判與爭論，才生生剝去了孔廟的神聖外衣。親臨孔府，感受著兩個時代、兩種文化意識的撞擊，一尊尊高聳肅穆的石碑記述著歷代帝王祀孔廟的事跡、述說著這裏曾經的莊嚴與輝煌，而身邊攢動擁擠的參觀人群、莘莘學子的虔誠祭拜也體現著新時代的聲音。不再是國家權威的政治象征，孔廟和孔子被輸入了更多的道德、文化象征性，雖看似親民，實則其影響力卻要畫個問號。南方如孔府這樣人聲鼎沸的孔廟恐實難見，孔子則多以陪祀的身份出現於佛道寺廟中。誠如黃老師所言，在傳統帝制，孔廟雖未被做為宗教，但其在事實上扮演著公共宗教的角色，而如今褪去神聖化的孔廟與孔子，似乎反而變成宗教中的一個配角，雖也有國家在其背後的宣揚，但却蒼白太多。但無論如何，在孔府的過去與如今的背後都是國家意識的表達，而眼前的盛景至少說明其在齊魯大地散發的“勃勃生機”。

另一方面，城市的興衰亦在講述著類似的故事。鄭培凱老師通過對《金瓶梅》中所描述物質文化的細節描寫，展現了一個受江南物質文化嚴重影響的北方城市（臨清）的繁榮景象，而這一繁華則完全仰賴京杭大運河的流通。不過東西文明的碰撞却給了運河致命一擊，於是在沖突的場景中我們看到《鐵漿》中上一輩以性命相搏所換來的血淋淋的利益，卻難保下一代人一世榮華。通過對運河旁邊山陝會館、光岳樓、運河博物館、鄉村記憶博物館的參觀，我們隱約拼湊出運河運作時河邊城市的繁榮光景，但泛綠的河道、破敗的鈔關也真實體現著運河的衰落及城市如今的“繁華落盡”。在如此的反差中，似乎交通對於傳統中國城市發展的關鍵性作用盡顯無疑，但另一個問題也同樣明顯，即這樣的北方城市下所產生的文化究竟是更靠近江南，還是具有更多的北方特色或齊魯特色呢？此外，國家的因素呢？就運河修建本身的目的而言，除了軍事外，更為滿足統治者的物質需求，可以說其存在本就是至高皇權的絕對象征，而河邊的城市發展與物質文化傳播或許只能算是其副產品，或許北方城市與文化發展的最終動力仍要歸結於國家的政治動因吧。

總體而言，研習營學習的過程中，遇到的問題多過所獲得的解答，而也正是如此多的疑問，方顯旅途珍貴。本次研習營收獲甚多，最后，真誠感謝為研習營付出的所有人員！